



(日本) 児玉實英著
杨占武 侯玉海 陈建中 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美国诗歌与 日本文化



美国诗歌与日本文化

(日本) 児玉實英 著

杨占武 侯玉海 陈建中 译

本书出版承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资助,谨致谢意!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美国诗歌与日本文化

杨占武 等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师大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2.5 印张 4 插页 300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3241-8/G · 2808(精)

定价：16.00 元

序　　言

美国人民是生机勃勃的人民，她吸收并消化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美国人民又是具有独创精神的人民，她兼容并蓄地融合各民族的文化并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美国人民长期以来把欧洲各民族的文化看成是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从欧洲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成分。

与此同时，美国人还对亚洲印度、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各国人民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从 19 世纪以来，美国文化不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部分了。

论述欧洲文化对美国文学影响的书籍汗牛充栋，而论述东方文化对美国文学影响的书却寥若晨星，这种现象非常令人失望。

本书追溯了日本文化对美国主要的作家惠特曼、朗费罗、艾米·洛厄尔、庞德、雷克罗斯以及加里·斯奈德等人产生影响的过程。众所周知，在日本文化的背后是伟大的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我相信，中国的读者会高兴地从中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以及美国文学的影响。本人希望这本书对了解美国和日本以及了解进行跨文化和交叉文化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有所帮助。

对本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做出贡献的杨占武、侯玉海和陈建中先生以及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尤其是最先提议出版此书并鼓励关照此书出版工作的蔡恒教授，本人在此表示感谢。本人还要感谢

滨西荣一先生所给予的关照和帮助。最后对慷慨解囊资助本书出版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表示我的感谢之意。

兒玉實英

1991年于京都

目 录

序 言

导 论	(1)
-----------	-----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历史背景.....	(7)
第二节 惠特曼、朗费罗与日本.....	(11)
第三节 20世纪初：关于日本的题材	(25)
第四节 寻求日本文化的价值观	(33)

第二章 艾米·洛厄尔和阿德莱德·克莱普塞

第一节 洛厄尔与日本	(44)
第二节 克莱普塞的五行诗	(67)

第三章 埃兹拉·庞德

第一节 庞德对东方的兴趣	(77)
第二节 庞德和芬诺洛萨：《神州集》.....	(83)
第三节 能乐和《诗章》.....	(148)
第四节 七湖诗章.....	(156)

第四章 肯尼斯·雷克罗斯

第一节 《凤凰和乌龟》.....	(178)
第二节 《山外》.....	(189)

第三节	旧金山文艺复兴.....	(193)
第四节	《心苑/苑心》.....	(196)
第五节	后期诗歌.....	(214)
第五章 加里·斯奈德与其它诗人		
第一节	战后美国与日本.....	(230)
第二节	理查德·赖特及其俳句.....	(232)
第三节	理查德·威尔伯瓶中的神怪.....	(243)
第四节	美国俳句.....	(248)
第五节	艾伦·金斯堡和俳句.....	(256)
第六节	加里·斯奈德在日本.....	(262)
结语		(306)
注释	(312)
参考书目	(355)
索引	(372)
译后语	(388)

导 论

1860年,为签订协约,日本“双剑”使者团访问了美国。美国纽约市民举行了盛大游行欢迎他们。有感于当时的盛况,惠特曼(Walt Whitman)写下了《百老汇大街上一支壮丽的行列》(A Broadway Pageant)这首长诗。在那宏大的游行场面里,诗人窥视到了东西方融合的端倪。惠特曼奉劝那些“自由之子们”向“日本尊贵的使者们”“低下骄傲的头颈”。在诗人看来,那壮观的行列隐约预示着东方将对美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新鲜、“高雅”、博大、优秀的东方哲学能够消除不和,缓和冲突。后来,惠特曼把这些看法融化并体现在他“宗教民主”的思想之中。

诚如惠特曼所预见的那样,近些年来,美国诗人对日本及其文化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兴趣。本书追寻历史的轨迹,回忆了当初美国诗人发现日本,并从日本诗歌的主题、形式、态度以及观念中受到启发,开创了一代诗风的始末;对从惠特曼、朗费罗(Longfellow)时代开始,经过庞德(Pound)、洛厄尔(Lowell)和意象派时代,一直到雷克罗斯(Kenneth Rexroth)和斯奈德(Gary Snyder)等历代诗人及他们的创作风格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和恰当的评价。

除诗人之外,美国的作家和戏剧家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一直对日本兴趣盎然。本书对作家和戏剧家涉及不多,并非因为他们不值得一提,而是因为诗人们已经从日本汲取了从纯美学角度看来,于其艺术最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把自己认为是精华的部分进行扬弃、改造并吸收进自己的艺术中,借此丰

富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虽然美国诗人眼里所观察到的日本并不足以代表日本的全部形象，但是却的确堪称日本最优秀的一部分。

1877年，亨利·华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ordsworth Longfellow)在《陶器》(Keramos)一诗里，描述过伊万里陶器及其构思精妙所反映的日本美。他的儿子查理(Charles)去过日本，从日本给他写过许多信并寄过无数的日本古玩。朗费罗试图在他的诗中“再现”多彩多姿的日本形象，并且在那些来自日本的自然物的“摹本”的启发下，开始从美学观点上思考他的“艺术”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二十世纪初叶，当日本热风靡美国时，庞德创作了一些“类俳句诗”，如《在地铁车站》等。诗人洛厄尔则写过一些类似庞德意象诗的短诗，其追随者尚有弗来切(John Gould Fletcher)、艾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希尔达(H. D.)及其他意象派诗人，他们都受日本俳句及庞德“叠合理论”(Theory of superposition)的影响。阿德莱德·克莱普塞(Adelaide Crapsey)是一位名气不大、但却至关重要的“无意识意象诗人”(Unconscious imagist)。她创作了许多字字珠玑的五行诗，谓之曰“五行体”。诗人“五行体”的创作受了法译日本短歌的启发，因日本短歌也是五行一首。

同其他意象派诗人相比，庞德可谓是一个幸运儿。他设法获得了芬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的笔记手稿，笔记里有能乐、中国古诗及汉语评注的粗糙英译稿。庞德对这些译稿进行了“重译”。例如，其中有李太白的诗《长干行》，诗人在诗中塑造了一个年青、温柔、纯真的唐代商妇形象，同李白相比，庞德译诗中的主人公形象倒更酷似日本热时期美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日本妇女形象。

倘若没有日本俳句、短歌和浮世绘的影响，意象派运动的理论或成就只能是一纸空谈。意象派诗歌在其格调、表现手法乃至意象的塑造技法等等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述各艺术形式。由于日本热的兴起，这些诗人得以更直接、更扎实地鉴赏俳句和短歌的英语译作，在精妙细腻的日本文化中陶冶他们自己的情性。毋庸

讳言,如果没有世纪之交风靡北美的的日本热,也就不会有意象主义运动本身。

本书在第一章里,首先列述了上述诸位诗人的历史背景,尔后,扼要论及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各位诗人,并对全书内容进行了概括。在写作这章时,我从厄尔·迈纳(Earl Miner)所著《英美文学中的日本传统》(*The Japanese Tradition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里受益非浅。该书涉猎范围远比本书广泛,包括英美出版的小说、戏剧和美术,论述全面,高层建瓴,的确不失为一本好书。然而,由于某些例外原因,该书未对美国诗人逐个进行评论。此外,该书出版于1958年,从那时以来,“颓废派”(Beats,亦译为“垮掉的一代”或“敲打派”——译者)及其他诗人发表了大量诗作,明显表现出日本文化的影响。有鉴于此,研究和论及这些材料就很有必要了。

在第二章及后续几章里,我分别详细考证了那些深受日本诗歌影响的美国诗人,其顺序是:第二章,艾米·洛厄尔;第三章,埃兹拉·庞德;第四章,肯尼思·雷克罗斯;第五章,加里·斯奈德。此外,本书还论及了其他几位诗人,其中有: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T·S·艾略特(T. S. Eliot)、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伊沃尔·温特斯(Yvor Winters)、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理查德·威尔伯(Richard Wilbur)以及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urg)。在这几章中,我按图索骥,不遗余力地寻觅诸位诗人在其诗作中吸收和再现日本文化观念的踪迹。

当然,较之于美国文学得益于日本日本文学则更多地受惠于美国。实际上,美国所有著名诗人、作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都被译介入日本。夏目漱石受益于惠特曼、波(Poe)、詹姆士(William James)等,更远者则有莎士比亚、雪莱及奥斯丁。西胁顺三郎则更与庞德、艾略特其他现代派诗人以及拉弗格(Laforgue)、波德莱尔(Baudelaire)、马拉梅(Mallarmé)等人联袂唱和。大汇健三郎深受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弗朗斯·卡夫卡(Franz Kafka)及让-保罗·萨

特(Jean-Paul Sartre)的影响。近年来,日本的比较文学家对外来文化对日本文化在创作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外,问津日本文化对外国文学影响者尚为数寥寥。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并斗胆用英语写成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两位可敬的美国学者的鼓励:C·L·巴伯(C. L. Barber)教授和诺尔曼·霍姆·皮尔逊(Norman Holmes Pearson)教授。我在阿默斯特学院求学时,曾有幸亲耳聆听巴伯教授令人激动不已的《美国现代诗歌》课程。后来,在耶鲁大学访学期间,我曾与皮尔逊教授共事。不幸的是,这两位宗师现已双双谢世。此外,促成我写这本论著的,还有我在日本结交的同僚和在美国结识的朋友,其中有耶鲁大学的阿尔斯特罗姆(Sidney Ahlstrom)教授和波考韦基(Sacvan Bercovitch)教授、福田陆太郎教授及北垣宗治教授等。倘使这本书能使他们以及对本题目感兴趣的人们感到满意,我将不胜荣幸。

在写这本书过程中,我查阅了洛厄尔一些未曾发表过的信件,以及她的一些藏书。这些资料诗人故后遗赠哈佛大学,现编入休顿图书馆书目。朗费罗一些未发表过的信件,现保存在剑桥国立朗费罗故居里。芬诺洛萨的手稿笔记,收藏于耶鲁大学拜内克善本及手稿图书馆,该馆还藏有莱特未曾发表的诗歌。在此,我对这些机构里的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们允许我把他们藏书的引文在此发表。我感谢富尔布赖特奖学金委员会、美国学术委员会以及同志社女子大学,它们的经济资助使我得以读到上述各种资料。我还要感谢雷切尔华尔兹夫人,她安排我和她父亲庞德分别在意大利的拉巴罗和法国巴黎会面。庞德把他《诗章》49章写作的原始资料——日本画稿和诗歌一一的复印件赠送给我。同时,我要感谢雷克罗斯,他耐心解答了我提的许多问题并提了许多建议。

中村惠先生帮我校订了参考资料,已故的吉川光次郎教授帮我翻译了汉语诗歌。特别要感谢同志社女子大学的贝德福德

(Richard Bedford)教授、木村俊夫教授、松山信直教授、塔克尔(B. D. Tucker)及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教授。此外,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迈纳(Miner)教授,他细心通读了本书的打印稿,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不过,书中若还有别的纰漏,那概由我本人负责。

书中汉语名称一律依汉语拼音先拉丁语音化,然后再按威妥玛式(Wade System)拼写出来。日语名称则采用同志社版《新日英辞典》里的音译形式。在必要的地方,汉语名称附有印在圆括号里的日文译音,如 Chang—an(chōan)。以上做法十分必要,因为芬诺洛萨和庞德的作品中,有数量众多的日译汉名。反之,书中引用拉丁化日译汉名的地方,汉名译音则用方括号附在后面,如 Anroku-san[An Lu—shan]。

日本人名通常用两种方法进行翻译。明治维新前流行的人名,一般姓在前,名在后,这是日本传统的拼写方式,如 Matsuo Bashō Minamoto no Morotada。而那些明治维新后开始流行的人名,则名在前,姓在后,如 Soseki Natsume(夏目漱石)、Yasunari Kawabata(川端康成)等。

本书某些章节的部分内容以前曾经发表过:第一章是以我1979年6月9日在日本比较文学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美国作家何时观注日本》(*When American Writers Look at Japan*)的论文为基础写成的;第三章里有关《神州集》一节,曾刊登在《佩德玛杂志》第二号第二卷上(1982年秋出版),原稿用日文写成。该章中《七湖诗章》(*Seven Lakes Canto*)刊在《佩德玛杂志》第二号第六卷上(1977年秋出版),当时题为《潇湘八景》(*The Eight Scenes Of Shō-shō*);论述雷克罗斯一章是从我的论文《雷克罗斯与日本古典文学》(*Kenneth Rexroth and Classical Japanese Literature*)节译编成的,原文是日语,刊登在《评论年鉴》(同志社女子大学)20、30卷上和《水仙》(同志社女子大学英国文学学会刊物)20号上。上述论文经增补后,部分刊登在《方舟》(*Ark*)14期《纪念雷克罗斯》的栏目里(纽约,1980《方

舟》),题目为《雷克罗斯与日本——来自远东的追念》(*Kenneth Rexroth and Japan; A Homage from the Far East*)。乘此机会,我对出版者允许我在这里重印这些部分表示感谢。本书的其余部分均属首次在这里与读者见面。

近年来,日本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评论家的关注。琼·雅克斯·塞万·施雷伯(Jean-Jacques Scrvean-Schreiber)在其《世界的挑战》(*Le Défi Mondial*,1980年)一文中写道,日本已变成了一个强国,这是西方“巨人们”一手创造出来的。他声称,这个“奇妙”的国家,是“技术上最伟大的国家”,处于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在其论著《世界头号强国日本》(*Japan As No. 1*)一书中,分析了日本人际关系模式和收集信息的特殊方式。他给此书加了一个副标题《美国的教训》(书中实际上更多地指出了日本的教训)。然而,我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虽然经济学家和工程专家们此刻才开始探索日本模式,但美国的诗人们吸收日本的文化观念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倘使这本书能博得那些关心日美关系的人们的喜爱,我将欣慰不已。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历史背景

很早以前，一些美国人士就对日本有所了解。独立战争前，绝大多数美国人仍以英国臣民自居，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他们自己历史和文化的组成部分。^①当时，尽管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对远东的了解还很有限，但这有限的知识也同样为美国人所拥有。

通过马可·孛罗及其他游历东方的欧洲旅行家，通过圣弗朗西斯·泽维尔(St. Francis Xavier)等西班牙传教士，通过约翰·萨利斯(John Sarris)船长及其东印度公司驻日官员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理查德·科克斯(Richard Cocks)，后来，又通过荷兰商人和海员等，有关日本的情况才零零星星但却持续不断地传到了不列颠岛。^②据皆川三郎记载，1613年，伦敦计有50个日本人。^③一名非国教清教徒在1620年乘“五月花号”去美洲前，曾在阿姆斯特丹和莱顿居住过12年之久。他与一些英国商人和荷兰航海家有交往，这些人后来“慷慨答应带他们同行”。^④可想而知，他们起码间接地从自远东归来的荷兰船员那里听说过一些日本的情况。此外，当时居住在麻省海湾移民区的早期移民看来也听说过东方“财宝如山”的神奇传说，有关这点，有安妮·布雷兹特丽特《给

夫君》一诗为证：

I prize thy love more than whole mines of gold,
Or all the riches that the East doth hold

我羡慕遍地的黄金，
我向往东方的财宝，
但我更珍惜你的爱。

由此可见，这位“人间缪斯”和其他移民一样，可能也听信了当时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传说——日本遍地都是黄金。这一传说源自马可·李罗有关“日本国”的记载。他写道：“他们的黄金丰富无比”。^④

同样，那些后来去美国的人们肯定喜爱航海。他们中有些人读过理查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和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的《哈克鲁特遗书，或珀切斯游记》(*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1725)一书，书中有航抵中国和日本沿途所见更为真实的记载。他们也可能读过恩格比特·肯普弗(Engelbert Kaempfer)编著的《日本史》，此书 1727 年在伦敦出版。然而，比该书流传更广的则首推比它早一年出版的《格列佛游记》。书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依据威廉·亚当斯、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以及肯普弗等提供的素材，在第三次航程结束时，^⑤安排他的主人公去了日本的“江户”和“长崎”。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有些美国人甚至在他们去美国之前就对日本有所了解。但他们有关远东的全部知识则是从欧洲大陆和英国间接得来的，换句话说，走的是西向的传播路线。

独立战争后不久，美国的船主开始同中国进行贸易。起初，他们用私掠巡航船运货，后改用快速大帆船，其中有些船只航迹远达合恩角。^⑥这样一来，美国人开始直接了解远东，他们将要在世界的另一方重新发现日本。因此可以说，他们有关日本的知识走的是

东向的传播路线。

首批美国商船是 1791 年抵达日本的，比佩里 (Perry) 探险早了整整 62 年。两艘美国商船——“华盛顿夫人号”和“格雷司号”——满载铁、铜器和皮革制品由中国返回美国，途中，“为风浪所阻”，驶进了纪伊半岛南端的大岛樫浦港。^⑧“华盛顿夫人号”船长约翰·肯德里克 (John Kendrick) 设法和当地日本人取得了联系。“从一个叫美国的邻邦来了一伙开着巨船的红毛”。消息传到当地官府，他们即下派了一伙武士去驱赶红毛，可当他们赶到海边时，那两艘船已经加了燃料和水开走了。^⑨

在日本附近海面发现高产渔场之后，来日本的美国船只就逐步多起来了。这些船一般取道檀香山或北太平洋，再绕过小笠原群岛进入日本海面，有些船甚至深入到陆中海岸。当时，一艘捕鲸船出海一年可以捕杀 500 头鲸鱼。但与此同时，这些船也曾救过不少失事遇难的日本船员和渔民。1813 年，尾州的顺吉和其他两名失事船员，在太平洋上漂泊了整整 15 个月之后，在加里福尼亚附近被一艘英国船救起。1832 年，音吉和九吉、岩吉乘宝顺丸漂入太平洋，14 个月后，抵达俄勒冈海岸，但海上沿途却未遇到一艘美国船只。^⑩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活动在日本水域的美国捕鲸船数量增多，它们救过许多日本人的命。1841 年，西滨的传造和其他四名土佐渔民船只失事后，生活在鸟岛的一个岩洞里，后被美国“约翰·豪兰德号”捕鲸船发现救出，带到夏威夷。在这帮人中，就有后来以“约翰·芝”闻名于世的万次郎。当时，他被带到麻省费尔哈温威廉·惠特菲尔德 (William Whetfield) 船长的家里，并在那儿接受了教育。^⑪

同年，赫曼·麦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也乘“阿卡会什特号”在太平洋上谋生。^⑫十年后，他写下了《白鲸》这本不朽之作。书中，他把日本比作漂浮在“宁静的太平洋中”的银河。

太平洋翻滚的波涛是世界海洋的躯干，印度洋和大西洋

则宛如它的双臂。这波涛冲击着人类新诞生的一代刚刚扶起的屏障——加里福尼亚新建港镇的防波堤。这波涛洗刷着一尊尊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老的女神的裙裾——太平洋沿岸各国虽已黯然失色但仍不失其雄伟的边城港汊。在东西洋岸宽阔的怀抱里，漂浮着一组屹立在波涛中，绵延千里，由珊瑚礁组成的银河——神秘的日本。

当时，在很多美国船上大概会一览日本沿海的秀丽风光。在 1814 年吉亨特协议签定以后，私掠船被取缔，海盗船基本匿迹，美国船队可以安然无恙地航抵世界各地，停泊在连绵起伏的日本各岛。¹⁴ 即便如此，日本仍然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且“神秘莫测”的国度。因为当时除荷兰人之外，其他外国人如果踏上日本国土，就要被处死。但是，因船只失事漂流到日本的美国人通常经过盘查、审问之后，用肩舆（四人抬的大轿，当时上乘的运输工具）送往长崎。之后，再让他们乘荷兰船行至南海，最后辗转返回美国。奇怪的是，在佩里探险前不久，经荷兰半官方机构特许、悬挂荷兰国旗的美国船却可获准进入长崎港进行贸易。因此，美国人就比英国和法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日本，他们可以迫使日本政府向他们开放一些港口，并更好地接待失事船员。

几次试探之后，美国政府最后决定派“密西西比号”和“萨斯奎纳号”及其它几艘护航舰和炮艇开赴日本。1852 年元月 28 日，一位名叫吉定斯的议员在国会发表演讲：

我们海军造船厂已显示出非凡的实力。这就使我们政府有理由认为，向日本派去强大舰队的时机已经成熟，借以敦促天皇诏准我们归还船员之要求，大概还可使他们向我们开放更多的通商港口。去年七月，我们派了“萨斯奎纳号”蒸汽动力护航舰去日本。随舰赴日的阿里克海军准将带去了菲尔莫尔总统给天皇的亲笔信，建议两国亲善并且通商。作为友好的表